

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李长林¹, 胡劲松²

(1.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科技处, 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 陈寅恪在日本、美国和德国留学期间接受了兰克史学的熏陶。陈寅恪的史学与兰克史学多有相似之处: 史学方法上强调广泛占有资料并严加考证; 在史学思想、史学观点方面奉行人文主义、客观主义, 注意运用民族(种族)文化观念治史。陈氏归国后又又在大学教学中实行了“习明纳尔”这种教学方法。

关键词: 陈寅恪; 兰克史学; 人文主义; 客观主义; “民族文化观念”; “习明纳尔”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4074(2007)01- 0064- 08

作者简介: 李长林(1931-), 男, 辽宁沈阳人,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胡劲松(1967-), 男, 湖南长沙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科技处副教授。

关于陈寅恪先生与兰克史学的关联, 一些学者多有注意。汪荣祖指出: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时, 正当兰克学派盛时, 对兰克史学必定熟悉, 无论有意或无意, 寅恪后日撰述, 每能以偏观全, 尺幅之间, 可见千里”。很能发挥兰克这一见解的妙处。^{[1](P49)}

陈其泰说: “陈寅恪这样的学者原来即熟悉乾嘉考史方法, 赴德留学后, 对于兰克学派这门考证的科学自然迅速接受并且心悦诚服”。^{[2](P99)} 其他一些论者也认为陈寅恪治学时接受了兰克学派的影响, 但都无具体论述, 提出实证, 只有张广智写有专文, 《傅斯年, 陈寅恪与兰克史学》。^[3] 令人遗憾的是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一书中有专章将陈寅恪作为“史料学派”的首要代表加以评述, 但毫未提及陈氏与兰克史学的关系。^{[4](P260- 287)} 在国外学术界也有类似情况, 德国学者 Schneider, Axel 的《真实与历史——寻求中国现代身份的两位史学家》一书, 以陈寅恪、傅斯年两位具有留德背景的历史学家为个

案, 探讨他们创建中国新史学的文化意义, 颇见功力, 可惜对他们与德国历史学学术渊源揭示不多, 例如其与兰克史学的关系, 便未能做深入研究。^{[5](P40)} 鉴于学术界对陈寅恪与兰克史学关联的研究不足, 本文兹就有关问题略作探讨。

一、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期间接受了兰克史学的熏陶

我们在探讨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关联时, 有一定困难, 因为他不像梁启超和胡适那样, 在中年以后大写回忆录, 大谈自己的思想。陈寅恪只是在为冯友兰作《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的时候, 才提了两句: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 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 议论近乎曾湘乡, 张南皮之间”。陈寅恪晚年曾嘱他人写关于他本人研究方法的介绍, 但未成稿。^{[6](P182)} 在陈寅恪发表的所有论著中都没有直接

* 收稿日期: 2006- 12- 10

论述过兰克学派对他的学术思想的影响。至今我们只发现一则他关于介绍兰克史学的信息。据陈寅恪的学生李坚回忆,陈寅恪 1942 年在广西大学法学院政治系讲授“唐代政治史”时,他曾在黑板上写了好多西方历史学家的外文名字,其中有德国考据学派史家兰克(Ranke)。^[7]是不是可以这样处理,即我们在考察陈寅恪与兰克史学关联时,不一定非找出陈寅恪如何直接宣扬,介绍兰克史学的实例。著名的战国策派代表人物雷海宗,在中国宣扬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他的论著中也没有直接关于斯宾格勒史学观点的评述,但是大家一致认为雷海宗在史学研究领域运用了文化形态史观。有的学者指出“服膺和借鉴别人的理论与方法是一回事,自己的著作能否真正体现这种理论与方法又是一回事。”^{[8](P2)}看来,陈寅恪接受兰克史学是采取“中西会通”的形式,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陈先生的著作里有很多洋东西,可是你看不出来,他把洋东西融化进民族形式中,读起来只感到是中国自己的。”^{[9](P6)}陈寅恪虽未曾特别介绍兰克及其史学,但就寅恪的著作看,他颇能抓住这位大师的好处,原因是他能融会贯通,而后由“通”而“悟”^{[1](P49)}另有学者用“暗合”来解释陈寅恪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指出:我们“虽然可以推断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肯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却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倘若我们注意到陈寅恪所说的‘暗合’,也许会有所帮助,因为陈寅恪不止一次用过‘暗合’一语,如‘昔王静安先生论红楼梦……其旨与亚里斯多德之论悲剧,及卢梭之英雄论文暗合。’所谓‘暗合’,至少可以作如是理解:首先‘暗合’意味着融汇化合而非生硬的结合,……其次,要做到‘暗合’,必须善于舍弃西方文化中不适合中国文化的部分特别是某些形式,而只运用借鉴其精神实质,用陈寅恪的话就是:“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10](P89)}

陈寅恪了解兰克史学并接受兰克史学的影响,始于 1904 年他第二次在日本留学期间。陈寅恪的学生杨联升追忆道,陈寅恪 1935 年在清华园讲授隋唐史时曾说:他在日本留学时,“日本帝大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11](P187)}陈寅恪在这里提到的“日本帝大派,西学较佳”是指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兰克学派”对东京帝大史学研究的影响。曾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作为兰克学派代表之一的里斯(L. Riess, 1861—1926) 1886 年来日本,任东京帝大史学系教授,至 1902 年回国时为止。里斯在任教期间把兰克的史

学方法和史学思想传给了日本。与里斯共事的坪井九马三(1853—1936) 接纳兰克史学, 著有《史学研究法》一书, 1900 年作为讲义出版, 1903 年正式出版。在书中他把历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史料阶段—收集历史的材料, 为造成历史补助; 第二阶段: 考证阶段—史料的整理, 这指的是对史料进行外部的和内部的批判; 第三阶段: 史论阶段—对经过整理的史料, 进行解释, 综合和复活。专门研究东洋史的白鸟库吉也接受了兰克学派的影响, 他把兰克学派和中国乾嘉学派结合起来, 产生了日本东洋学体系。白鸟库吉是里斯第一届学生, 他对里斯十分敬重, 据他令孙白鸟芳郎回忆说: “祖父晚年在床上经常把里斯的讲座笔记置于枕边, 这是一部精致厚厚的制本, 用英文书写, 十分贵重, 这对祖父来说, 大概是回忆起了许多深沉的东西。”^{[12](P226)}白鸟库吉根据兰克学派的史学方法研究东洋诸国的历史, 陈寅恪对上列诸人的史学成就多有熟悉。陈寅恪从 1909 年到 1925 年在欧美各国留学, 又直接受到了兰克学派的熏陶。

刘梦溪归纳陈寅恪治史的特点有八: “一是在史识上追求通识通解; 二是在史观上格外重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 强调文化高于种族; 三是在史料运用上, 穷搜旁通, 极大地扩大了史料的使用范围; 四是在史法上以诗证史, 诗史互证, 借传修史, 使中国的文史之学达致贯通无阻的境界; 五是参证古史而能做到古典和今典双重证发, 在古典中注入今情, 给枯繁的考证学以新的生命; 六是对包括异域文字在内的治史工具的掌握, 并世难有与其比肩者; 七是融会全篇的深沉的历史兴亡感; 八是史著文体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13](P37)}

下面兹就这几个方面, 对陈寅恪的史学与兰克的史学暗合之处逐一进行评述。

二、陈寅恪与兰克在史学方法上的相似

兰克强调一切历史研究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史料高于一切, 他说“我对浪漫小说感到厌恶并决心在我的著作中避免一切虚构和捏造, 始终坚守事实。”^{[14](P220)}他还提出“历史学家应批判地考证史料, 并系统地以此作为叙事的依据。”^{[15](P105)}历史学家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 根据这些资料写出“公正无私”的历史。

陈寅恪在治史过程中一贯重视史料的搜集与

考证, 他的学生周连宽回忆说: “先生治学, 最讲科学方法, 凡是建立自己的论点, 必先从时间, 地域、人物有关社会历史各个方面, 尽量搜集有关资料以为依据”^{[16](P345)} 陈寅恪认为史料未得其全, 不能进行研究, 史料得其全, 但语焉不详且无从印证, 也不能进行可信的研究。也许正因为如此, 他曾对学生说: “有些问题值得讲, 但一时材料缺乏也不能讲。”^{[6](P94)} 许冠三认为陈寅恪在史料扩充上有五个层面的表现, 一是不断发掘“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陈寅恪通晓希腊、拉丁、英、德、法、日、俄、和梵文、巴利文、蒙、藏、满、西夏、突厥、兀吾儿、于阗、波斯, 共 17 种文字, 大大便利了这种发掘。二是广泛利用中国各种古籍注释, 例如《三国志》裴注, 《世说新语》刘注, 酈道元《水经注》、《资治通鉴》胡注等。三是博采历代类书, 例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乃至道藏、佛藏等等。四是重视诗词证史, 垂青神怪小说, 厚爱笔记、野乘和地志, 在科名录、药典、书谱、墨迹、农书等。五是把历代史论作为遗迹使用。^{[4](P261-262)}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注意到陈寅恪与兰克一样, 重视档案资料。兰克曾说“最可信和最有价值的记录”在档案库里。他为了搜集资料遍访了柏林、德累斯登、维也纳、罗马、威尼斯和巴黎等地的档案馆。陈寅恪认为档案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陈寅恪指出: “清乾隆以前《实录》, 皆不可信, 而内阁档案之存者, 亦无人过问。清人未入关前史料, 今清史馆中人几无一人知之, 其于清初开国史必多附会。”^{[17](P42)} 因此, 他经常从清华园赴大高殿查阅军机处满文档案, 还与陈垣、傅斯年等发起成立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 从内阁档案整理编辑出《明清史料》三编、三十巨册。

兰克不仅主张治史时要广泛占有史料, 而且还强调对史料要进行严密的考证, 他指出: “有的人抄袭古人, 有的人为未来的时代寻找教训, 有的人攻击某些人或为某些人辩护, 有的人只顾记录事实。对于每个人必须分别加以研究。”^{[18](P180)} 意即对这些人提供的史料都要仔细甄别。在利用文献过程中, 兰克提出了一整套史料批判的方法, 即采用“外证”与“内证”相结合的方法, “外证法”是通过史料表现的形式, 如语法、体例等是否合乎史料生成年代的规范来确定史料的真伪, 通过不同著作, 不同版本的互相校勘, 使史料真伪毕现。“内证”法是通过对那些不同人所著的内容相同的史料进行参照分析, 结合对撰述人的身世、性格、心理等方面的考

察, 确定史料的可信度。

陈寅恪在史学实践中也重视史料的考证“他总是说你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 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 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19](P29)} 陈寅恪在谈到中国哲学史研究时认为“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 或散佚或仅存, 或晦涩难解, 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 绝无哲学史可言。”^{[20](P839)}

陈寅恪在运用“内证”法时, 熟练地采取了语言比较法, 这种方法曾是兰克治史时采用的方法, 兰克在鉴定历史著作的原始性方面, 主要通过训诂方法比较行文的风格, 语法和用词。这和他在莱比锡大学学习过古典语言学有关。陈寅恪在欧美留学期间也接受过语言学的教育。1918 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师从蓝门(Lanman)教授习梵文和利文, 后来在柏林大学又随鲁斗(Lieders)继续研究梵文和巴利文以及东方古文字, 学习时主要是用西方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陈寅恪在《与妹书》中写道: “我今学藏文文甚有兴趣, 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 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同属一系, 以此之故, 音韵, 训诂上, 大有发明, 因藏文数千年用梵音字母拼写, 其变迁源流, 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方法, 为中藏文比较之学, 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21] 1933 年陈寅恪再次强调: “迄于今世, 比较语言之学兴, 旧日谬误观点得以革除”。“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及其性质如何? 非综合分析, 互相比较, 以研究之, 不能为功。”^{[22](P29)} 陈寅恪在研究中, 注意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 对史料和史实作出新的解释, 显然, 他的这种研究方法, 已经超越了乾嘉学派的学者。

陈寅恪在教学中也注意引进比较语言学, 他在清华大学讲授和指导过《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鹘文译本之研究》等。陈寅恪运用比较语言学治史取得重大成就, 仅以佛教典籍的考释而言, 在 1927-1933 年的七年中, 他发表近二十篇序、跋、释、论文, 都是用异文写本和遗文遗物与考据对象互相比勘, 如《斯坦因 khara-khoto 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 就是取中译本与西藏重译本、斯氏残本比勘参校, 以定其优劣异同。^{[23](P76-741)} 但陈寅恪运用语言比较法, 并不局限于典籍异同, 他还要分析异同中所体现的意义, 把语言比较引申到文化史问题的研究, 如 1932 年发表的《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即是一例。^{[24](P749-755)}

三、陈寅恪与兰克在史学思想、史学观点方面的暗合

兰克的史学思想具有人文主义因素,著名史学史专家古奇认为:兰克“他特别注意历史中人的因素”。^{[25](P177)} 吴于廑也注意到了兰克的人文主义思想,指出:“兰克曾一再说明历史学的任务是如实叙述客观存在的事实,历史上存在过的事实,除去自然界发生的灾异变化,都出于人为,写历史事实也就是写活动于历史上人的作为,兰克说‘剥去事物的外壳,就见到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人的行动,人遭遇的困难,人的奋发。”^{[26](P318)} 古奇又指出:“兰克他的第一部著作,(即《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引者注)显露出他对人格的兴趣……。他常常宣称历史上的决定因素是实干的人,而他采用的各章标题都更加使人看出他对这种人的重视”^{[25](P177-178)}。余英时也对兰克的人文主义观念作过评述,指出:“兰克他绝不是一个只考订一件件孤立的事实的人,更不是一个以史料学为史学的人,他和许多现代史学家一样把人当作历史的中心。正唯如此他总认为历史的真实不能由抽象的概念得之,而必须通过对‘全部人生的透视’(clear contemplation of total human life)然后始把捉得定。但人生决不能限于衣、食、住、行之类有形的、客观的物质生活,思想、信仰、情感种种主观的精神上的向往,同样是真实人生的一部分。”^{[27](P26)}

有的学者认为兰克的人文主义思想对陈寅恪产生了影响,指出:“在来自19世纪西方史学影响中,还有一些观念性的东西成为陈先生终生所坚持的原则,如兰克对历史中人的因素的高度重视。”^{[28](P181)} 学者还具体论述了陈寅恪在史学研究中阐发的人文主义:“陈先生在进行‘文史互证’时,‘从诗文中所开掘的史料价值,并不仅表现在从制度、名物诸方面的史源补充,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诗中所表达的情感、人文心灵的探索,凸现了历史活动的真正主角——人,从而把物质观念、制度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人类在心灵上追求自由独立的历史,这样,就使得他的‘文史互证’方法在境界上远远超越以往的考据史家,而具有一种深厚的现代人文主义精神。而这或许是陈先生除方法论之外,在所研究问题之内容上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现代学术气息的奥秘所在。”^{[28](P170)} 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是一部充满人文主义的代表作,陈寅恪本人,也很注重在大学里开展人文主义教

育。^{[29](P873-875)}

兰克在治史时运用了“民族(种族)——文化”的观念,古奇曾指出:“兰克认为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单独生存,每个民族的特性只有在同各个民族接触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发展。”^{[25](P188)} 兰克强调民族传统和“普遍的历史的生命”对于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兰克宣称:我们不可能只依靠个别民族的历史,民族在时代的进程中承袭了一代代传下来的遗产,这就是:物质和社会的进步,宗教与天才的创作,以及把人类连给络统一起来的对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的回忆。我们看到一种普遍的历史的生命,它在民族或民族集团之间不断地流传着。”^{[25](P209)} 兰克这些看法,反映了他对各民族历史联系的重视,对世代形成的民族传统的重视,民族精神无与伦比价值的重视。

据周梁楷《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历史观点——从西方学术背景所作的讨论(1880-1930)》一文介绍,德国学术界从18世纪以来,特别偏爱从文化史的角度,思考政治与民族问题,“从赫德、兰克以来,种族和文化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日耳曼学者的脑海里,……在20世纪20及30年代,德国学术界承其遗风,以种族与文化论述历史。”^[30] 这种重视“民族(种族)——文化”关系的观点和方法,在傅斯年和陈寅恪的论著中有明显的体现,据陈其泰考察,运用“民族(种族)文化”观念治史,所关注的重点有三。(1)重视研究分处于中心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不同民族(或种族),在政治、文化上既对峙又互相影响、渗透的关系;由于这种互动关系,引起中心与周边民族(或种族)集团文化特征上的变化和政治势力的消长,导致全局性历史的盛衰变化;(2)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包括其风俗、信仰等)是影响历史演进的很重要的因素,处于中心地区的民族与边境民族(或称“蛮族”)文化上的高下并不是绝对不变的,由于原先处于后进地位的周边民族的“剽悍”、“质朴”的文化成分,加入到昔日先进而后来正衰颓的中心地区的民族实际中,会大有助于恢复其活力,演出历史的新场面;(3)民族的先进和落后,不是绝对一成不变的,有的时候,原先落后的民族(或称“蛮族”)因吸收了先进的文化因素而居于先进地位,原先先进的民族(或其一部分)也因周围环境影响而退居于落后地位,甚至民族(或种族)界限也非绝对不变,而是会发生双向“同化”现象,并予历史演进以大的影响,这确是研究历史的新视角,能由此发现新的研究课题,得到一些新层次的认

胡守为指出：陈寅恪治史“极重文化，他曾反复强调种族和文化是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关键，他一生著述亦多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分析社会形成一个文化系统。他指出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认为种族之分，多系于其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文化超出了种族的范围。因此，相信‘有教无类’因而也就批评了个别民族优越论及种族歧视。”^{[32](P20)}关于陈寅恪在撰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时，如何运用了“民族——文化”观念的，陈其泰在《“民族——文化”观念与傅斯年，陈寅恪治史》一文中也作了具体的评述。^{[31](P222-229)}

兰克认为：“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就可以再现全部历史真相。”^{[43](P28)}可见，兰克在治史方面提倡的是一种客观主义，即治史应该客观公正，不夹杂个人的政治偏见，宗教偏见，要如实地还原过去的事实。陈寅恪治史也奉行客观主义，李坚回忆其师陈寅恪1942年在广西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讲授《唐代政治史》时，提出“史学工作者要超然物外，不存偏私，用全部精力去掌握历史材料，再现历史真实，然后才能正确作出是非和道德的判断。”^{[34](P248)}不止于此，陈寅恪还提出诂释作品，考察史料过程中，史家应始终其有“了解之同情”，移情于研究对象所处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场景中去，体会其所感所言之所以然，这种了解之同情，与史家对其研究对象的爱憎无关。从陈寅恪提倡的了解的同情，令人联想到德国学者洪堡提出的“移情式理解”的原则(Verstehen)。即历史学家必须身临其境地理解历史事件，透过表面现象的个别性和独特性从而抓住其实质。兰克从洪堡的理论出发，认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身临其境地理解历史现象中秘密的含义，即在当时占据领导地位的思想这样一种无形的世界。”^{[35](P320)}兰克还说：“对于千变万化的人类活动要有真正的‘同情’和‘爱’，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人们的德性和缺陷，幸运和不幸，制度和道德，以及每朝国王和事变的进程，”“任何情况下，我们对谬误和正确下评语，我们的任务是深刻的了解它们，以完全客观的态度描述它们。”^{[36](P125-126)}综上所述，我们发现陈寅恪提倡的“同情的理解”与兰克坚持的“移情式理解”何其相似！而“同情的理解”也好，“移情式理解”也好，它们都构成贯彻客观主义的重要原则。

陈寅恪不仅认同客观主义，而且付诸于实践，最明显的表现之一便是他不从事晚清历史的研究，他谙熟晚清历史，但因先世与这段历史有割不断的恩怨，故而向学生表示，我自己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因为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37](P266)}，他还对他人治史时不坚持客观主义，作过批评。1945年，梁启超弟子吴其昌撰成《梁启超传》，材料多取自乃师的《戊戌政变记》，陈寅恪批评梁的《戊戌政变记》作为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吴的《梁启超传》亦为一时之情感所动荡，故此传中关于戊戌变法之论述犹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也。”^{[38](P148)}

在兰克的历史著作中，我们处处能看到他对个体性的关注，正是凭借这种认识，他将历史与哲学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哲学企图将现实缩成一个系统，牺牲了历史世界的独特性，而历史寻求在个别中理解普遍。”汪荣祖在评述陈寅恪对兰克史学融会贯通时指出：“很少人注意兰克曾择取黑格尔‘史’、‘哲’之说，认为历史研究为了解哲学问题之本，但黑氏的‘史’、‘哲’合一说，每以历史为哲学的附庸，随一己之意气，裁断史实。就此点而论，兰克恰反其道而行之。(即上述兰克所主张的历史寻求在个别中理解普遍——引者注)，其实，这一点与章实斋‘六经皆史’说有相似处——即从历史研究中去了解‘经典’(哲)，也就是寅恪所说的，‘从史实中求史识’的意思。”汪荣祖又认为兰克重视史实发生之趋势。意义及特征，并从单一事实中去了解全面，“寅恪后日撰述时，每能以偏观全，尺幅之间，可见千里，很能发挥兰克这一见解的妙处。”^{[11](P49)}汪氏在这里的评述，实在指出陈寅恪是有高明的史识，颇能宏观的考察历史现象。蒋天枢也注意到了陈寅恪能“从史学中求史识”这一治史功底，他写道：“陈师对历史研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发现。”^{[39](P62)}在史料处理上陈寅恪既反对掺杂个人的私念，又反对缺乏同情的了解，他在谈及撰写中国哲学史时，指提出有一种偏向：“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据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右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谈中国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40](P839)}陈寅恪在这里阐发的道理，是说今人

不应以今人、今事改铸古人古事。关于“同情的了解”的必要性,陈寅恪还作过说明,他认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其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了解,则其学说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之一小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之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回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40](P88-839)}关于陈寅恪在研究西魏北周关中本位政策时,如何进行“真了解”的,王永兴作过评介。^{[41](P126-131)}

四、陈寅恪式的“习明纳尔”(Seminar)

兰克在柏林大学任教期间,从1833年起直到1871年他退休时为止,开设了历史专题研究班(Seminar),通过这种教学科研形式培养了大批历史专业人才。兰克的直接弟子济伯尔回忆参加专题研究班的经历时写道:“兰克允许学生自由选择自己的课题,但由于他的学识异常渊博,随时都可以向学生建议研究某些有教育意义的问题,学生由于忽视批判原则而出现错误时,兰克的批评是无情的,然而态度是友好的。至于其余一切,他允许每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搞,他经常注意教书的最高原则,即学校工作并不是塑造天才,而是发展天才。”^{[42](P242)}从这些记述中,可见兰克在主持专题研究班时贯彻以下几项原则:(1)发挥学生独立思考,提倡学术自由,(2)严格要求学生,坚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所谓“忽视批判原则时,就进行无情的批评。”)

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期间,亲自经历过专题研究班这种形式的培养教育,他回国后,在大学任教期间,又主持过历史专题研究班,奉行了兰克在研究班所倡导的各项原则。1935年在清华大学讲授隋唐史时,首先讲解应读及参考的书籍,指导学生如何看待与运用材料的方式,以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

力,陈先生是通过史料的分析传授研究方法^{[43](P266)},据翁同文回忆,1940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任教,开设魏晋南北朝史时,他只讲他本人的研究成果,如有论文发表就不再讲有关内容,只布置学生阅读。^{[44](P192)}另据吴小如回忆,1946-1947年他在清华大学中文系选修陈寅恪先生的《唐诗研究》这门课时,陈先生不采取讲授制,凡选修者只须拟定一个论文题目,经先生同意自行准备,定期向他汇报学习情况,并当面请教问题,到学年末上交论文,评分。^{[45](P288)}看来陈寅恪先生在运用“习明纳尔”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充分发挥了这种教学科研形式的优越性。通过专题研究班培养了一批文史人才,传授了他的史学方法与史学思想。

五、余论

综观陈寅恪在学术生涯中,面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他坚持开放的态度,他明确表示,“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比。”^{[29](P875)}陈寅恪在考察了古往今来的学术史之后指出,“其实能在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46](P843)}而陈寅恪所倡的“取珠还椟”说,表明他认为在中外文化交流交流中,我们不应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而应主动去挑选,自己决定取舍的标准。陈寅恪在治史过程中吸收了西方的史学(包括兰克史学),并且把它们与中国传统史学积极的因素结合起来,这是肯定无疑的,至于他吸收消化了兰克史学的哪些内容,我们难以以索引,注解的方式一一说明,我们只能概略地指出暗合之处。

行文至此我们还要回答一个问题,一个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即究竟是傅斯年还是陈寅恪更像兰克?谁可称之为“中国的兰克”?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兰克史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给兰克史学以全面的定位。张广智曾指出:“兰克的史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从他的著作中,确立了这样一个兰克的形象:实证主义者、史料考据者、客观主义者。但这是兰克史学的表象,显然是不全面的,是表面的说得严重些乃至是虚假的。而强调研究人、人的思想、信仰和情感、时代的精神或理念,主张设身处地理解人和历史,渲染历史运动的神秘力量,这才深入到兰克史学的深层,兰克这一形象才是本质的,因而也是真实的,以上两者在他那里须臾不可分,这就是兰克作为西方历史主义最伟大

实实践者的全部形象。”^{[47] (P227)} 我们不宜对陈、傅两位先生在史学成就方面做高低之分作比较,而只从两位与兰克史学的关联方面进行对比时发现,傅氏偏重于吸纳兰克的史学方法,而陈寅恪是史学方法与史学在思想并重,除此之外,张广智曾指出:“陈寅恪在追求史学的求真背后又更藏着深远的宏旨,即他治史的最终目的是在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之后就要得出微言大义式的结论。正是在这方面,他也似兰克,这就区别于“史料派”的“舵手”傅斯年”。^[3] 盛邦和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一文说傅斯年的方法是“存而不补”、“证而不疏”,主张将材料依原来的样子整理,一旦整理好了,道理自然显明,这显然与陈寅恪相左。^[48]

参考文献:

[1] 汪荣祖. 史家陈寅恪传[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 陈其泰. 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3] 张广智. 傅斯年, 陈寅恪与兰克史学[J]. 安徽史学, 2004, (2).

[4] 许冠三. 新史学九十年[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3.

[5] 叶隽. 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 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7] 李坚. 陈寅恪二三事[J]. 民国春秋, 1990, (5).

[8] 耿云志.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 前言[A]. 郑大华, 邹小站. 思想家与中国近代思想[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9] 罗新. 思想与境界: 学术的生命——田余庆先生访谈录[A]. 原学: 第2辑[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

[10] 刘克敌. 陈寅恪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1] 杨联升. 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A]. 张杰选编. 追忆陈寅恪[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12] 转引自严绍汤. 日本中国学史[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13] 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A].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4] 恩斯特·卡西尔著. 人论[M]. 甘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15] 莫米格利亚诺. 史学研究[M]. 伦敦, 1966.

[16] 周连宽. 回忆陈寅恪先生二三事[A]. 张杰选编. 追忆陈寅恪[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17] 陈守实. 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A]. 张杰选编. 追忆陈寅恪[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18] 乔治·皮博迪·古奇.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M]. 耿淡如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19] 赵元任、杨步伟忆寅恪、陈寅恪印象[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7.

[20] 陈寅恪.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A].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21] 陈寅恪. 与妹书[J]. 学衡, 1923, (20).

[22] 陈寅恪.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A].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23] 陈寅恪. 斯坦因 khara-khoto 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陈寅恪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24] 陈寅恪. 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25] [英] 乔治·皮博迪·古奇著.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上册[M]. 耿淡如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26] 吴于廑. 朗克史学与客观主义[A]. 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27] 余英时. 史学、史家与时代、史学、史家与时代[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8] 景蜀慧. “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A]. 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29] 陈寅恪.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国学术经典·陈寅恪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30] 周梁楷. 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历史观点——从西方学术背景所作的讨论(1980-1930)[J]. 台湾大学历史学报, 1996, (20).

[31] 陈其泰. “民族——文化”观念与傅斯年, 陈寅恪治史[A]. 瞿林东.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32] 胡守为.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 前言[A].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33] 兰克. 世界历史的秘密, 第24页, 纽约福德姆大学出版社, 1981, 转引自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34] 李坚. 陈寅恪二三事[A]. 张杰选编. 追忆陈寅恪[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35] 杨豫. 西方史学史[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36] 劳埃·利奥波德·朗克[M]. 普林斯敦, 1950.

[37] 石泉, 李涵. 追忆先师陈寅恪先生[A]. 张杰选编. 追忆陈寅恪[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38] 陈寅恪.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A]. 寒柳堂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39] 蒋天枢. 师门往事杂录[A]. 张杰选编. 追忆陈寅恪[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40] 陈寅恪.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A].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41] 王兴. 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42] 汤普森著. 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43] 石泉, 李涵. 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A]. 张杰选编. 追忆陈寅恪[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44] 翁同文. 追念陈寅恪师[A]. 张杰选编. 追忆陈寅恪[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45] 吴小如. 学林漫忆(节录)[A]. 张杰选编. 追忆陈寅恪[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46] 陈寅恪.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A].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47] 张广智, 张广勇. 史学, 文化中的文化[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48] 盛邦和. 陈寅恪: 走出“史料学派”[J]. 江苏社会科学, 2000, (3).

(责任编辑: 龙先琼)

Chen Yinke and Lanke's View of History

LI Chang-lin, HU Jirr so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While studying in Japan, US and Germany, Chen Yink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Lanke's view of history. Chen's view of history has many similarities with that of Lanke's: emphasizing possessing as many materials as possible and examining them carefully; keeping humanism and objective view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reat history with national cultural concept. After he returned to China, Chen pursued "Seminer" method in university teaching.

Key words: Chen Yinke; Lanke's view of history; humanism; objective; "national cultural concept"; "Seminer"

(上接第 63 页)

On the Time Features and Historical Position of Guo Songtao's Thought of "Morality and Custom"

PENG Ping-yi, HUANG Fa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Zhong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Qing Dynasty was faced with internal disorders and foreign invasions. The social morals degenerated as well. Seeing this situation, Guo Songtao put forward the social moral thought of "regarding morality and custom as the basis of building a country". The thought has bright moralistic, modern and practical features. However, it is not a true modern thought.

Key words: Guo Songtao; morality and custom; moral; Western morality and custom